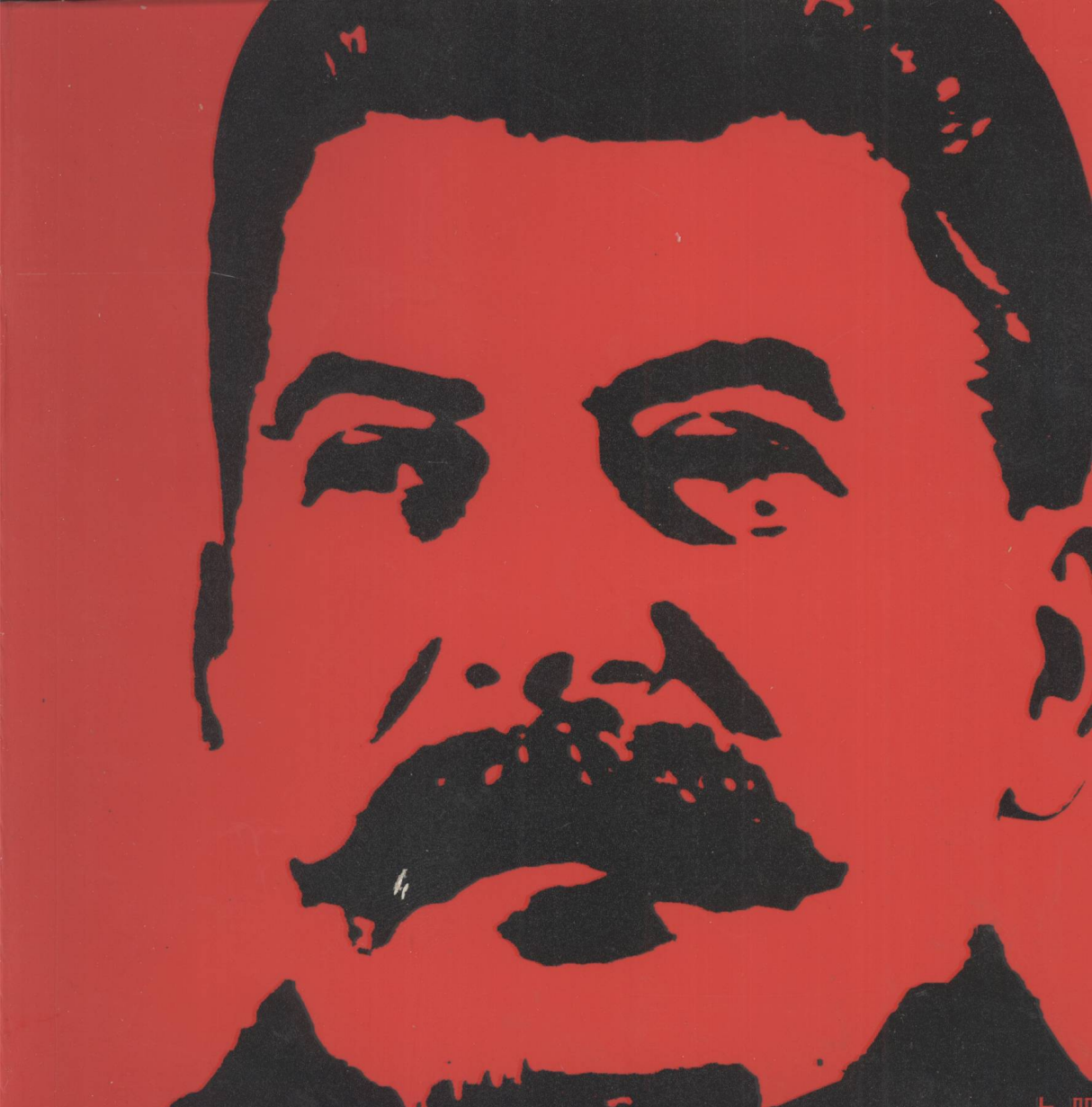




上册

〔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著
张慕良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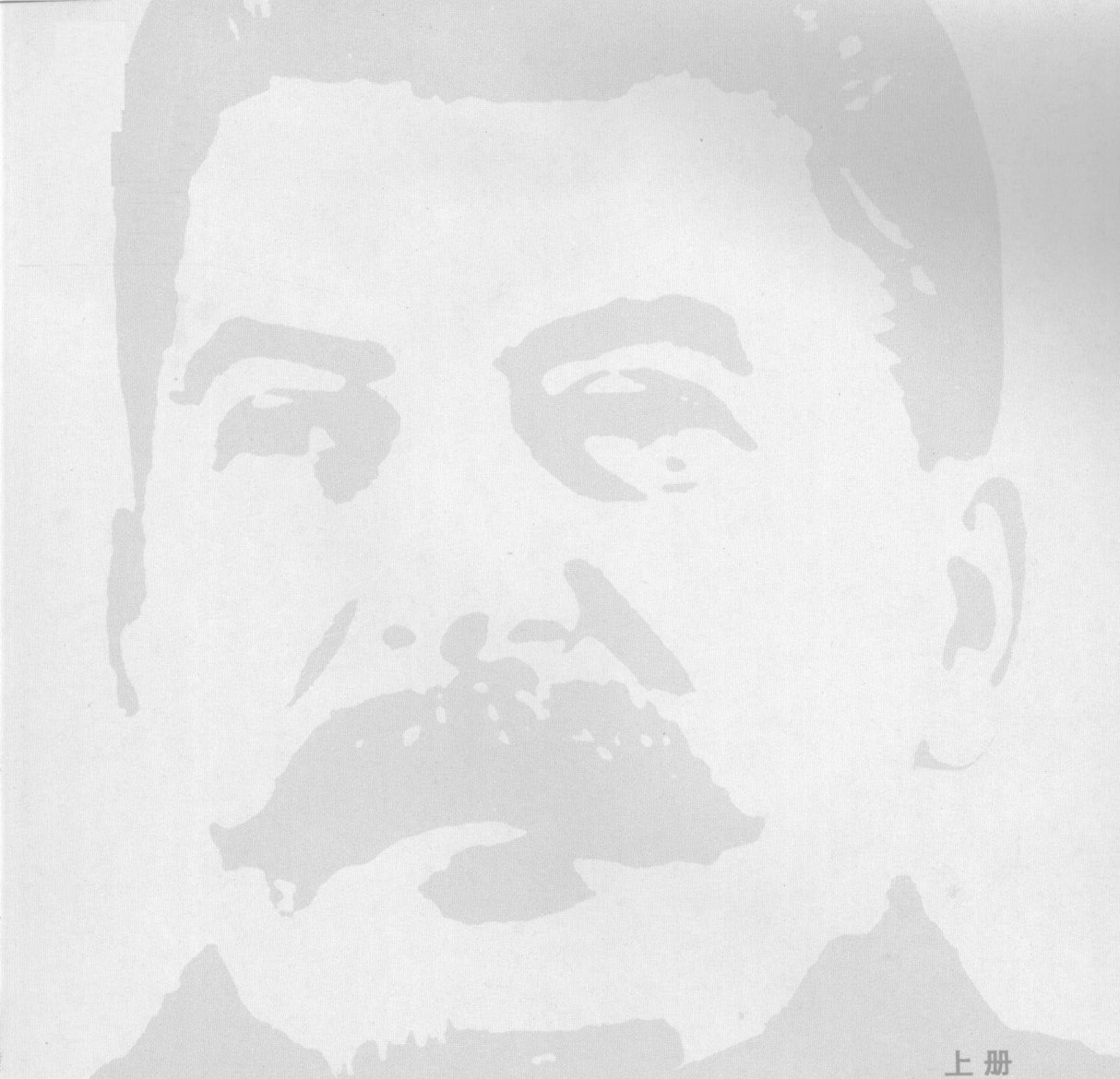
最新版修订本

斯大林

A BIOGRAPHY OF STALIN

世界上最经典的斯大林传记版本
中央编译局资深专家联手精译

国际文化出版



上册

[俄]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 著
张慕良等 ★ 译

斯大林

A BIOGRAPHY OF STALIN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目 录

CONTENTS

代绪论（斯大林现象）

第 1 章

十月的火光

- | | |
|-----------|----|
| 1 正面和侧面 | 25 |
| 2 二月序幕 | 37 |
| 3 扮演次要角色 | 44 |
| 4 武装起义 | 51 |
| 5 获得生存的机会 | 61 |
| 6 俄国的旺代 | 64 |

第 2 章

领袖的警告

- | | |
|--------------|-----|
| 1 战友们 | 83 |
| 2 总书记 | 97 |
| 3 《给代表大会的信》 | 108 |
| 4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 | 120 |
| 5 悲剧由来已久 | 130 |

第 3 章

选择与斗争

- | | |
|----------------|-----|
| 1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 146 |
| 2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 | 159 |
| 3 知识界的动荡 | 170 |
| 4 “杰出领袖”的失败 | 184 |
| 5 总书记的“个人生活” | 197 |

目 录

CONTENTS

第4章

是专政还是个人独裁

- | | |
|----------------|-----|
| 1 农民的命运 | 218 |
| 2 布哈林的正剧 | 231 |
| 3 关于专政和民主 | 247 |
| 4 “一个胜利者的代表大会” | 260 |
| 5 斯大林和基洛夫 | 269 |

第5章

披着领袖的“外衣”

- | | |
|-------------|-----|
| 1 “统治人物” | 288 |
| 2 斯大林的智力 | 299 |
| 3 恺撒主义的象征物 | 313 |
| 4 在“领袖”的阴影下 | 324 |
| 5 托洛茨基的幽灵 | 337 |
| 6 胜利者的声誉 | 347 |

第6章

悲剧的震中

- | | |
|---------------|-----|
| 1 “人民公敌” | 364 |
| 2 政治“审判案”闹剧 | 376 |
| 3 “学会重视人才……” | 391 |
| 4 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 | 405 |
| 5 斯大林式的恶棍 | 426 |
| 6 不可饶恕的罪过 | 435 |

目 录

CONTENTS

第 7 章

战争前夜

- | | | |
|---|------------|-----|
| 1 | 政治上的纵横捭阖 | 458 |
| 2 | 戏剧性的转折 | 471 |
| 3 | 斯大林与军队 | 485 |
| 4 | 国防武库 | 496 |
| 5 | 关于坦克制造业的状况 | 503 |
| 6 | 流亡者被刺 | 507 |
| 7 | 秘密外交 | 525 |
| 8 | 致命的错误 | 540 |

第 8 章

悲惨的战争初期

- | | | |
|---|-----------|-----|
| 1 | 丧魂失魄 | 561 |
| 2 | 残酷的岁月 | 577 |
| 3 | 艾蒿的苦味 | 596 |
| 4 | 灾难和希望 | 609 |
| 5 | 俘虏和弗拉索夫现象 | 628 |

第 9 章

最高统帅

- | | | |
|---|------------|-----|
| 1 | 斯大林和大本营 | 648 |
| 2 | 战争的“各章” | 663 |
| 3 | 斯大林格勒的光辉战例 | 677 |
| 4 | 最高统帅和统帅们 | 691 |
| 5 | 是一个战略家的思维吗 | 707 |
| 6 | 斯大林和盟国 | 727 |

目 录

CONTENTS

第 10 章

迷信的鼎盛时期

- | | |
|-------------|-----|
| 1 胜利的果实和代价 | 753 |
| 2 斯大林“秘密”内幕 | 767 |
| 3 周期性发作的暴行 | 784 |
| 4 年迈的“领袖” | 800 |
| 5 冷风吹来 | 812 |

第 11 章

恺撒主义的遗物

- | | |
|------------|-----|
| 1 历史的反常 | 834 |
| 2 教条主义的木乃伊 | 849 |
| 3 全面的官僚制度 | 866 |
| 4 人间上帝必有死 | 885 |
| 5 斯大林的遗产 | 902 |
| 6 历史性的失败 | 913 |

代结束语（历史的裁决） 923

注释索引 937

代绪论 斯大林现象

斯大林生命垂危。他躺在孔策沃别墅餐厅的地板上,已经无力站起身来,只是偶尔抬起左臂,像是在求人援救。领袖半睁的眼睑掩饰不住朝入口房门凝视的绝望神情。嘴唇无声地微微颤动,说不出话来。中风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是,斯大林身边没有任何人。最后,他的警卫人员在别墅窗外因久久听不到动静,感到焦急不安,才提心吊胆地走了进来。但是,他们无权立即请医生。这一情况是这位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万万意料不到的。当时需要由贝利亚亲自下命令才行。夜里人们找了他很长时间。但是他却认为,斯大林不过是在夜里饱餐之后睡熟了。直到过了十一二个小时,神色慌张的医生们才被带到生命垂危的领袖跟前。

这样的死本身就有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命运的捉弄是无情的。一个临死前已经受了病魔几十小时折磨的领袖,在需要的时刻却得不到抢救。而这个人就是他,一个几乎称得上人间上帝、用几句话就能把几百万人从国土的一方打发到另一方的人!他所建立的官僚“秩序”把这位领袖本人也当做了它的人质。斯大林缓缓熄灭的意识总算还能真正认清他长期经营所建立的现行的关系体系僵化到了何种程度。

生与死之间的无形界线是只能单向跨越的。连领袖们也无法再跨回来。斯大林未必知道,他和其他的领袖不同,面临的不仅是肉体的死亡,而且是政治上的死亡。他的逝世对同时代人来说似乎是极大的不幸。他们当时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人把几百万人丧命仅仅看做一桩官方内部统计的事。斯大林死后给后人不仅留下了一个弄清他究竟有何建树的长期课题,而且留下了关于他的命运之“谜”的激烈争论。笔者作为绪论题词的列宁语录中有“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说法,许多人认为连这一说法也不适用于斯大林。他的死不

2 斯大林

能成为应该原谅他的理由。斯大林的一切成就、业绩和罪行都要由历史来裁决。神话破灭了,但要彻底肃清影响,只能靠事实真相。

他的全部情况只有他自己知道。斯大林不喜欢中间色调:要就是白,要就是黑。为了让后人见到的他的传记充满明亮的色调,他无疑是费过心思的。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料想到古罗马曾有过《记忆判罪法》。根据这项法律,凡是不合新即位皇帝心意的一切都必须忘掉。但是我们知道,这项法律不过是更突出地说明给人的记忆规定清规戒律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它——记忆——的存在(或消失)有其根本不同的规律。历史总是“一挥而就”,写得工工整整。它没有什么草稿。已经过去的往事只能在头脑中、在思想中回忆,就像电影“倒片”那样。斯大林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为了让这部“纪录片”不留下不需要的镜头,他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愿意让人知道的事情。

遗憾的是,有许多细节、事实和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无可挽回地湮灭了。而遗忘正是历史的深渊。请想一想:在我们之前世界上生活过700亿到800亿人。不管人类多么希望记住往事,连这几百亿亡灵的大部分人名都不可能再记住了(更不用说他们的身世了!)。历史的深渊是无底的。但是,并非一切都会从记忆这张巨网的网眼中“漏掉”,坠入它所覆盖的遗忘的无底深渊。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不管现在活着的人对他的态度如何,他有可能永垂文明史册,只要文明还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优秀的传记作家。他总是能作出比较一致的评价。

在20世纪80年代的今天,在人们对祖国历史篇章的本来面目发生空前浓厚兴趣的时候,社会上在评价斯大林作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确实大相径庭。但是细想起来,现在对历史的关注,其焦点并不是斯大林。斯大林不过是象征着被历史打了折扣的一切。关注的中心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痛苦、我们不幸的困惑:我们今天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现象在当时为什么能出现和存在。如果需要用墓志铭来表示人们对这个人物的态度,我想铭文是会多种多样的。一方会镌刻大致如下的铭文:“你的错误众所周知,你的功绩无可争辩”;截然相反的另一方会刻上:“你的罪行不能饶恕,你的‘遗产’是沉重的包袱”。随着过去年代极其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随着能够不受限制地正视过去这种机会的到来,目前这种舆论“大相径庭”的局面会逐渐消失。这决不会是朝着某种“中间”立场的方向发展,而会沿着尽可能弄清真相的道路前进。真理不应该是奢侈品。一旦真理成为我们思想的实质,对斯大林现象看法上的二元论就没有容身之地了。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人们在生前就为自己建造纪念碑的做法是徒劳的、靠不住的、不实际的。历史有权选择从“哪个角度”追念某个人,——这种权利是绝对的。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就已令人信服地证明,对一个人的历史评价辩证地取决于他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但由此当然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历史上的个人才在社会进步这座金字塔积满尘土的阶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历史不单纯是各个时代和时期的依次更迭,它也是陈列世界风云人物历史群像的无尽画廊。他们并不是全都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意义,但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位置。的确,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看清他们,对他们作出评论。这一点之所以必须特别指出,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整整几十年中苏联的历史看上去就像深夜的大街,“不见人影”。许多历史人物、事件、事实和过程仿佛受到了古代《记忆判罪法》的惩治。但是这种沉默迟早会用呐喊、甚至怒吼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们大家不能不感到欣喜的是,眼下一个不仅革新现在,而且“修复”、恢复过去的积极过程正在进行。因此,斯大林这个人物大概就成了激起社会对过去关注的思想和感情的震中。在我国历史著作中大概没有比他更充满矛盾的人物了。对他既有赞扬也有辱骂,褒贬之词多到足以评价历史上一大批活动家。

到未来“旅行”是艰难的、没有把握的。到过去“旅行”也并不轻松些。正如路·费尔巴哈中肯指出的那样,这件事总是像“心中的刺”,使人忐忑不安。我们审视过去那些依稀可见的人物形象,看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样的人物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也属于现在和未来。他们的命运,对于思考存在、时代和良心来说,是世界观方面永久的“养料”。在对斯大林研究开始时就已逐渐形成的结论之一就是:这个人的一生就像聚光点,照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极其复杂的辩证发展过程。历史不会没有“曲折”。斯大林这样的人当上党的领袖、实际上也是人民的领袖,正是这种悲剧性的“曲折”、社会的丑恶现象,从而突出地说明新生的社会还不成熟。

党正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方法作历史性选择的紧要关头失去了列宁,在这之后党进入了一个激烈内讧的时期。“列宁的近卫军”在某个阶段并不胜任,未能看出斯大林对党、对尚未巩固的民权制度来说是一个危险人物。其结果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越来越表现出创造的一面,而是越来越表现出惩治的一面。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如果不把暴力用作达到政治目的的主要工

具,那就不成其为笔者试图为之写评传的斯大林了。暴力在实际上成了实现社会经济计划和纲领的决定性的手段之一。政治方针的这种转变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开始了,在党的“十七大”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转变带来的是痛苦的年代,当时全靠十月革命蕴藏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全靠党对列宁主义的坚贞不渝,才能使人民不致怀疑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中断列宁开创的史无前例的改造世界的事业。因此,随着真理日益揭开历史的真相,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这并不是偶然的。这里先摘引两段。

请看摘自《联共(布)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祝贺斯大林70岁寿辰的颂词》(1949年)的一大段话。“你,斯大林同志,和列宁一起,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鼓舞者和领袖,是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年代,是你的组织和统帅的天才引导苏维埃人民及其英勇的红军战胜了祖国的一切敌人。斯大林同志,在你的直接领导下,为建立各民族苏维埃共和国,为它们组成一个联盟国家——苏联,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的每一项改造,不论大小,你都为之贡献了自己的才智、旺盛的精力、钢铁般的意志。有伟大的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指导和鼓舞苏联人民为繁荣我们光荣的祖国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劳动,这是我们的幸福,我国人民的幸福。斯大林同志,在你的领导下,苏联变成了伟大的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世代将赞颂苏联,赞颂你的名字——斯大林同志,赞颂使世界文明免遭法西斯暴徒摧残的救星……斯大林的名字是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普通人心目中最珍贵的名字。”^①

再看另一种评价。尼·谢·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24日深夜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著名的扣人心弦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创造了‘人民公敌’的概念。这个术语顺理成章地排除了证明某个人或某一批人犯了思想错误这种必要性。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采用违反一切革命法制准则的最残酷的镇压手段,迫害任何一个在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上同斯大林意见不一致的人,迫害那些仅仅有图谋进行敌对活动嫌疑的人,还有那些曾有过不好名声的人。‘人民公敌’这个概念本身在实际上排除了发生某种思想斗争的可能性,或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可能性,即使这个问题并不是理论性问题,而是实际问题。有罪的主要证据,实际上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被告人承认犯了受到指控的罪行的‘供词’,而这是违反一切科学的法学原理的。后来的审查表明,这样的‘供词’是靠对被告人施行肉刑的办法逼出来的。

“这就导致对革命法制闻所未闻的破坏,结果使许多一向捍卫党所贯彻的

路线而完全无辜的人遭难。”

这些实际上由同样一些人作出的结论和评价，仅仅过了几年就截然不同了。在前一种情况下，是一味地肉麻吹捧。我想，贺词的作者们搜索枯肠也找不出更多的最高级形容词能用来赞颂这位人间上帝了……在后一种情况下，是着重指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给我国人民、给党、给人道主义理想造成的损害。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实质上是犯罪行为。而这说的的是一个领导党、国家和人民30多年的人！当然，我们要立即补充一句，对所干这一切的责任问题要复杂得多。难道斯大林周围最亲密的人都没有责任吗？难道我国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在提供社会保护、使自己的公民免遭违法行为伤害这方面是称职的吗？广而言之，那些对别人的命运有过这样或那样影响的人是否把该做的都做到了？难道人人都相信，父亲、儿子、兄弟、妻子、邻居、同事会突然成了“人民公敌”吗？历史的英明在提示我们：真正问心无愧总是有希望的。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之后，社会上在评价斯大林及其他历史人物的活动方面开始省悟，可惜后来的进展放慢了，不仅如此，有人还开始采取措施，想让斯大林作为政治活动家起死回生。在真相没有大白、对伴随个人崇拜的一切缺乏哲学认识的情况下，对我国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不管是更早的还是更晚的时期，今天也不可能作出恰当的分析。历史不单单是治病，而且也会在难堪的坦白过程中带来痛苦。良心的裁决总是能使人心地坦荡。就在最不幸的时刻，苏联人民还是以克己忘我的精神行事的。每一代人都为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树立和保持我们的理想及希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在一提起斯大林的名字，许多人的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悲惨的1937年，是接连的迫害，是对人性的践踏。尽管准确地说，1937年的惨剧也许是起始于1934年12月1日，谢·米·基洛夫被刺的那一天，也许是早在20年代末就初现端倪了。经斯大林同意的目无法纪的行为，犹如可怕的脓疮开始迅速成熟。不错，这一切都有过。对这一切负有罪责的人不容饶恕。但是我们也记得，就在这些年里，建起了第聂伯水电站、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出现了帕帕宁、安格林娜·斯达汉诺夫、布瑟金等等这样的劳动者。正是在这些年里，苏联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发扬，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达到了最高峰。因此，在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时否定社会主义的实际成就和原则上的潜力，从政治的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错误的，从道德上来说是不诚实的。这一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并不是因为接受了而是由于抵制了斯大林的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论。在民主的条件下，这些成就就会更大。当然，我们在评价斯大林或他周围一些

最亲密的同事时,不应当把这些评价硬加在千百万普通人的头上,因为他们对革命理想的真理性的信念从未被任何考验动摇过。

斯大林的功绩大,还是罪行大,用这种算术方法来评价过去是不正确的。这种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任何功绩都不能说明无人性是有道理的。既然几百万人因这个人的罪过而丧命,那么还有什么“功绩”可言呢?今天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他借助暴力使人民同权力异化,造成稳固的官僚制度和教条主义的共生。但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这要弄清楚权力机制变形的根源和原因。怎么会发生伟大和卑鄙“共居”、邪恶能用迷彩伪装成善良这类事?为什么许多人发生了社会的蜕变?悲剧在当时是否不可避免?我们的报刊上经常提出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的问题,这反映出我们近几年来所看到的、苏联人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文化在大大提高的过程。在不少情况下,特别是在公式化地了解本国历史的青年人中间,由于各种看法和主观主义的评价彼此截然对立,出现了思想上的惶恐,这就会产生社会虚无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藐视。满足渴望认识的要求,最好的办法是弄清真相,不管它是多么令人痛苦。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特别“可怕的是产生错觉和自我欺骗,害怕真理将招致灭亡”^②。

分析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分析两者在社会进步和民权制度中的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是从哲学上、政治上评述斯大林生平的根本立场。本书将仔细审慎地分析以“遗嘱”闻名的那些无比珍贵的列宁文献。斯大林在一生中不仅记住了,列宁在1922年12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他和托洛茨基是“杰出领袖”,而且也记住了列宁对他整个复杂的禀性以及乖僻性格的特点所作的坦诚而深刻、发人深省的评价。他也不能忘怀,列宁称布哈林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仔细研究斯大林的那些讲话就可以看出,总书记不止一次地,然而又是非常小心谨慎、字斟句酌、隐晦曲折地对列宁的这些评价表示了异议。例如,他心里是要反驳列宁,于是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喜欢布哈林,但是我们更喜欢真理,更喜欢党,更喜欢共产国际。从这一句话几乎可以充分看出斯大林其人:他忠于事业(他所理解的事业),但他阴险狡猾、诡计多端。列宁的结论是“斯大林太粗暴”,总书记加以曲解,说他“只是对敌人粗暴”……我在分析斯大林现象时求教列宁,使我一次又一次地确信,列宁的思想和过去一样仍在我们前面闪闪发光。这不仅是英明深刻的真理的特性,也是有预见性的真理的特性。

近几年来在我国撰写并出版了许多历史活动家的政治传记,如恺撒、拿破

仑、丘吉尔、戴高乐、毛泽东等等永垂史册的人物的传记。甚至出版了一本关于希特勒的书。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尽管国外出了好几十本书是写他的。国内发表的许多文学和历史作品谈到这个人活动的某些侧面和方面,正在填补这个空白。这些作品的出现,其效果犹如久旱逢甘露。毫无疑问,以后会出现历史学家写的关于斯大林以及关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等党和国家活动家的有分量的学术著作。而我鼓足勇气可能做到的只是为这个历史人物的政治画像勾勒出哲学的素描。我要强调:这不是传记,而是画像。这样就有可能也有权利依据大量文献和证据,不仅对斯大林内心世界的“隐秘”,而且对决定“领袖”行为的种种情况,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结论。我确信,斯大林现象不仅仅是偶然现象。它的出现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的。

有关斯大林个人的热烈争论并未沉寂下来。有如此大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按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斯大林的生命结束并不久,还不到40年,这就是说,他的命运同现在活着的人、同他们的长辈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中的许多人就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从“斯大林”时代过来的,因为每个活着的人都被永远禁锢在他那个时代的大桡战船上了。我国历史未愈的伤口还将长久地使人感到可怕和难以解释清楚。

对斯大林的生活篇章兴趣不减的另一原因,就是想重新认识社会的和全人类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公正、历史真实、道德理想。斯大林统治年代再次表明,教条主义思维会建起虚幻的哲学殿堂,在其中一切都必须起“永恒的”作用。其实,除了变化大概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教条主义的盲目性是危险的,它会把意识形态变成宗教。教条主义把一切人间欢乐推移到“明天”,明天又推移到“后天”。我国社会革命性的革新首先触动的是社会意识。教条主义和官僚制度成了批判和否定的主要对象,并不是偶然的,而这两者在我们看来很大程度上都同斯大林独裁领导的年代有关。

最后,对这个站在权力金字塔之巅30多年的人物的生平一直这样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原因不止这些)。斯大林不是像列宁那样就在人们身边、人们中间,而是高居人们之上。尽管吹捧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画像、塑像和著作不计其数,但是苏联人实际上对斯大林一无所知。战后出版的传略没有作者,而只有该书扉页所说的编者:格·费·亚历山德罗夫、马·博·米丁、彼·尼·波斯别洛夫等。这本由斯大林本人审订的传记概述了一个人的英雄业绩,但是这个人自己并未参与。

不错,斯大林的一些同时代人曾尝试撰写斯大林的政治评传。1936年出版

了昂利·巴比塞写的《斯大林传》一书。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随便看书中的哪一段,哪怕是不长的一段,就可以作出判断。例如,有这样一段话:“他的历史就是对一连串重大困难的一连串胜利。从1917年起,没有哪一年他没有作出可以使任何人万世流芳的业绩。这是一位铁人。他的姓就描绘出了他的形象:斯大林——钢。”^③叶·米·雅罗斯拉夫斯基院士在1939年出版了《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他在书中正确地指出,写斯大林,就是讲述党在建成我国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斗争的全部周折。但是这本小册子的基调不仅过分夸张,而且也有令人吃惊的对神明的亵渎。例如下面这段话就是证明:“各族的歌手在民歌中把斯大林同志比作热爱自己花园的细心的园丁,而这个花园就是人类。在我们这里最可宝贵的是人,是干部。关心人,关心干部,关心活着的人——人民珍视的正是斯大林的这一点,因此我们应该向斯大林同志学习。”^④卡尔·拉狄克在《群像和檄文》(1934年)这本书中有一篇长文章是写斯大林的,文中一个劲儿地赞美这个救世主。顺便提一下,拉狄克强忍屈辱为这个“领袖”歌功颂德,也未能使《群像》的作者逃脱不幸的命运。这类著作也和那些关于斯大林的虚意应酬的“回忆录”集子一样,学术价值不大。它们大多只是更加显露出斯大林及其周围一班人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以后培植起来的忠君媚上这类关系的丑恶性质。

人的生命像北方的夏天很快就过去了。它或许也像一堆篝火:小小的火花变为欢快跳动的火苗、熊熊的烈焰,然后是缓缓燃烧、微微闪光,变为暗红的木炭、冷却的灰烬……人,不管是大人物还是普通人,迟早总有一死。这是在某个时候总会到来的黑夜,永久的黑夜,那就永远再也不会有白天了。这个真理对所有人都是同样无情的。斯大林也懂得这一点。因此他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让后人在他死后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想起他。很遗憾,由于不无斯大林的参与及其战友们的帮助,在我国历史上不仅有许多“空白”,而且有许多地方在编年史中被歪曲了,甚至干脆从编年史中被撕掉了。这是笔者在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困难。

另一个是更一般性的困难。问题在于,每个具体人的意识都是一个完整的微观世界,一个巨大的难以捉摸的内心世界,它随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我们永远弄不清楚任何一个去了另一世界的人的全部情况,但是这种认识的可能性却是无限的。能说明斯大林의思想和考虑的,与其说是他的著作、书信、记录和决议,不如说是体现在社会实践中的行动,即他的成就、业绩,使我们感到难过的是,还有他的罪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的隐秘就不那么“神秘”了,只要我们知道它们的“养料”是什么,表现形式是什么,动机是什么。我们周围的这

个有人类生存的、多彩的、多弦的、多灾多难的世界,是解开包括斯大林这样的人在内的任何人的意识隐秘的主要钥匙。尽管对斯大林的行为作科学分析的逻辑在说明他的某些行动时有时也会把人引进死胡同。

例如,斯大林知道列宁对布哈林态度热情。斯大林本人多年来一直同他及其家属保持私人的友好关系。布哈林帮助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起了不小的作用。斯大林不可能看不出,加在布哈林头上的罪名,譬如充当间谍、搞阴谋等等罪名,看上去就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布哈林有很高的学术修养,能做到重视论据。他一经认识到自己那个否定强行加速社会主义发展的纲领同迅速变化的国际形势的现实有些脱节(因为历史不容许我国“慢悠悠走”),他就承认必须适当加快速度。不仅承认,而且积极参加执行党的方针。但是,这并未妨碍斯大林在事实上批准除掉这位非常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亲密的党内同志……这种事怎么能说得清楚、理解得了呢?!更准确地说,可以说得清楚,却难以理解。斯大林就是这样的人……

在准备写这本关于斯大林的哲学和生平的概论时,不知为什么我不知不觉地对有关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尤利乌斯·恺撒、奥利弗·克伦威尔、伊凡雷帝、彼得一世等人的著作发生了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领袖、独裁者、统治者以及其他专制型执政者的心理状态。尽管我懂得在这方面作任何历史类比是担风险的,也许是根本不科学的,但我还是想先发表一点看法。对拥有无限权力又不受民主监督的人来说,自以为一贯正确、自恃高明、自认为无所不能、对自己的才能估计过高是习以为常的。这些人即使生活在人们中间,通常也是极端孤独的。现已查明,斯大林极少同什么人一对一地谈话(参加谈话的通常有莫洛托夫或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尽管如此,他内心始终是孤独的。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同自己比较,不能同任何人真正地辩论,向任何人证明,向任何人表白……一人高高在上的处境、在现实中凝成的无限权力,使他的感情枯竭,把他的智能变成了冷漠的计算机。每采取一个步骤就立即成了“历史性的”、“决定命运的”、“关键性的”步骤,从而渐渐地扼杀了一个人的人性……

他一生中都在力图(而且不无成效!)把自己的某一弱点变成有力量的标志。早在革命时期,在需要去工厂、去团队、去街头参加群众大会,总之需要到群众中去的时候,斯大林就产生一种心里不踏实和惶恐的感觉,后来他逐渐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感情。斯大林不喜欢,大概也不善于在大庭广众中自如地讲话。他的讲话简单明了,但是缺乏丰富的想象力,缺乏警句名言和打动人心的

演讲技巧。口音过重、谈吐拘谨、语言乏味使他的讲话干巴巴。难怪斯大林在群众大会、在会见群众的场合、在游行示威时讲话的次数,比列宁周围的其他人都少。他比较喜欢起草命令、指示,写些文章、短评,在报上就某些政治事件发表一点评论。他是一个平庸的政论家,作结论时一板一眼,而且总是那样绝对。在他写的报纸稿件中不是一片光明,就是一片黑暗。他不承认还有他者。拉丁语般的明确性是他那些平铺直叙的文章引人注意的特征。

后来斯大林也习惯走上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讲台了。不过那时他的地位已经不同,人们是在肃静地聆听他那声音不大、慢条斯理的讲话,而这种宁静随时都会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接着而来的全场欢呼声撕破。但那些讲话更像万能的祭司主持宗教仪式。斯大林把自己尽量避免直接同群众接触这种态度变成惯例: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不去工厂,不去集体农庄,不去各共和国,也不去前线。在金字塔尖偶尔传出“领袖”的声音。在金字塔脚下千百万人带着对神的敬畏聆听他的声音。“领袖”把自己的不爱交往和孤僻变成了偶像和超凡者的标志。要了解斯大林就必须时时注意,他是一位颠倒黑白的大师,可以用错误、缺点、罪行以及他的性格中的不祥特征冒充为成绩、成就、远见卓识、对人的经常关怀……

我的分析和结论依据的是列宁的著作、党的文件,以及许多档案馆的材料。这些档案馆是:中央党务档案馆、苏联最高法院档案馆、苏军中央国家档案馆、苏联国防部国家档案馆、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档案馆,以及一些博物馆的档案室等等。例如,在接触到斯大林在军事方面的活动时,我在苏联国防部档案馆看了许多从未公布过的很有意思、很独特的文件。一看斯大林在军事文件上的批语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的回忆,就可以知道斯大林决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相信自己宣布过的事情的。例如,斯大林看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德·格·巴甫洛夫将军、B·E·克利莫夫斯基将军、A·T·格里戈里耶夫将军、A·A·科罗勃科夫将军一案的判决书草稿,其中指控这些人进行“反苏阴谋活动并蓄意破坏对西方面军的管理……”“领袖”看到这里就不再看下去了,而只是甩下一句话:

“别胡说八道……”

于是有人立即划掉了“反苏阴谋活动”、“阴谋分子的目的”、“敌对活动”等字样,改写成:“表现出胆小怕事、不行使权力、指挥不当,致使对军队的管理遭到破坏……”尽管这样的指控仍然是不公正的,但在1941年7月22日还是作出了最严厉的判决。当时“领袖”眼看国家和他斯大林本人受到灭亡的威胁,只是

不愿再“玩”“阴谋分子”的老把戏罢了。

斯大林的批示通常都是用红铅笔或蓝铅笔的,运笔洒脱,字迹清楚。望着这些保持得很好的行行批示,不由地会思索:这个人的非理性、残忍和阴险,其深刻的原因究竟在哪里?也许在于他早年大量吸取的宗教教条的养料?也许在于他痛苦地感觉到自己的才智不足?而这一点他在伦敦、斯德哥尔摩党代表大会上听列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唐恩、马尔托夫的精彩发言时就感觉到了。也许,这种非理性的根源在于他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形成的冷酷无情的性格。要知道,他在十月革命前的全部经历可以概括为7次被捕、5次逃跑。他从19岁起没有干别的,就是东藏西躲、执行党委交下的任务、一次次被捕、改名换姓、弄假身份证、经常改换住地……在监狱关押不久就逃跑,再次躲藏起来。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出国。

《真理报》30多年的材料、《布尔什维克》、《政治工作者》及其他期刊(其中有许多只是在20年代出版)的材料,对本书的写作很有帮助。大家知道,国外有许多关于斯大林的著作。有一部分著作,例如朱泽贝·博夫、路易·阿拉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基本上是从接近客观的立场写的。还有几十种新版和再版的书性质就不同了,其目的是“借助斯大林”来诋毁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斯大林自己未必理解这一点,但他自己的败坏社会主义名声的实践活动却比伊萨克·多伊彻、罗伯特·泰克、莱奥纳德·沙皮罗、罗伯特·康奎斯特等苏联问题专家的著作危险得多。会晤过斯大林的外国国务活动家——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毛泽东、恩维尔·霍查的佐证,以及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侨居国外期间出版的有些小册子,也都引起我一定的兴趣。

我阅读了斯大林在国内的政治思想对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的著作。他们都曾经是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他们中谁也不认为自己是斯大林“提拔”的,接任他们的职位的一批新的活动家,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等人,后来并不隐讳这一点。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是按照古代独裁者的法则行事的:自己提拔的人比较忠诚,而且不会觊觎最高领导的角色。

20年代初,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党内的知名度比斯大林高。例如,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人物在党内和人民中间的名气简直无法相比。就是这个托洛茨基,他作为十月革命公认的领袖之一、红军的创建者之一,作为知名的理论家(到1927年已经出版他的文集21卷!)载入了史册。这个果敢的政治家并无多少文学才华,